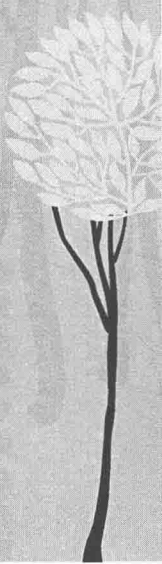


近代国语（文）教科书
外国翻译作品的选录

郭 睿 著



语文出版社



近代国语(文)教科书

外国翻译作品的选录

JINDAI GUOYU (WEN) JIAOKESHU
WAIGUO FANYI ZUOPIN DE XUANLU

郭 睿 著

 语文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代国语 (文) 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的选录 / 郭睿
著.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87-0020-2

I. ①近… II. ①郭… III. ①外国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0749号

责任编辑 朱春玲
装帧设计 肖华珍
出 版  语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asywp@163.com
排 版 语文出版社照排室
印刷装订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890mm × 1240mm
开 本 A5
印 张 11.875
字 数 309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32.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序一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饶杰腾

十年前，即2004年，郭睿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宏观角度潜修中外教育理论。而后又把教育学、教育史和课程论结合起来，进而具体研讨学科教材教法的课题。从宽广博大的宏观视野，深入到精细详尽的微观之处。“致广大而尽精微”，理论与实际的相互为用，使他的研究优势不断地显现出来。

在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领域，郭睿重点放在语文一科。自二十世纪初现代学制颁行开始，原本属于混合型的国文，于1904年得以独立设科。独立后的国语（文）教科书，除了主要选录本国古今语料外，又增添了外国翻译作品以为选文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于如何选录外国译作，教科书的编者，教师以及社会上历来十分关心语文教育的人们，很少作为重要课题深入探讨，以至成果寥寥。于是，郭睿经过反复琢磨，确定以国语（文）教科书中选编外国译作这一教育现象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把成果撰写为毕业论文。

郭睿的毕业论文经过修改补充成了这部书稿。读后，我就联想到徐老（特立）发表于1949年年底《新建设》上的一篇题为《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的文章。徐老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多种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艰苦复杂环境中，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七十余年。他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曾先后深入考察过日本、法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等国的教育。徐老在文中提到我国教育的“三化”，即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教育科学化绝对的意义，是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但“如果不民族化，就不能具体化和行动化”，所以，“教育科学化和

民族化，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

大众化是科学化和民族化的集合点和具体表现。具体到编选教材上，就是要使入选的内容是“大众的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术，基本的方法”。大众化的特点是必须“去空，去杂和去孤”。徐老文中指的“孤”是“单纯化的，没有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来源去路”。“杂”是“没有联系的知识，无生命的东西，非科学的东西”。而“空”则是“没有事实的理论，或没有与理论相结合的，又没有原则处理的，与原则无关的事实”。

郭睿的研究是关于国文教科书中外国译作选录的课题，外国译文的选编就是要体现“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术，基本的方法”，而怎样体现呢？就是要避免“孤”“杂”“空”，揭示译文选编的背景、思路和特质。

探讨外国译作的选编问题，要避免“孤”。首先必须弄清选编的背景，要纵向了解历史的发展，横向注重环境的影响，把纵横联系起来，以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并力求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郭睿认为，我国近代危机四伏的社会形势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也必然会反映在国语（文）教科书上，所以，选取外国译作是时代的需求。当时社会教育主流话语由传统的“明人伦”转为“中体西用”，后又发展为“启蒙开智”。其学习内容则从洋务时期的“器物”之学，到维新时期的“制度”之争以至新文化时期的“文化”之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除“去孤”外，还必须“去杂”。要从复杂纷纭的教育现象中，发现其中有机联系，以体现其科学的内涵和生命的意蕴。郭睿认为，译作内容的选择以及课程内容之间形成的逻辑和结构的合理性，要能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和作用。所选的译作表现了什么，从中体现了什么，译作传播了哪些先进的文化理念，给青少年哪些启迪，从语言以至行为产生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所有这些，在作者看来都体现了译作的常识系统和生命意识的融合。它使国语（文）的时空内涵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无论“去孤”“去杂”，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去空”的问题。作者认为，选入我国近代国语（文）教科书的本国古今语料，或是外国的翻译作品，都应具典范性，才能符合国语（文）学科的宗旨和教学目的。因为任何一篇入选的文章，都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力求得到尽可能完美的统一，也就是说，应具有典范性。如郭睿在以《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分析典范性时，就是从弘扬爱国情感和鲜明的艺术特点相结合的角度来阐发的。又以翻译的戏剧《月起》为例，就有“爱国和人性思考的主题和主要叙述方式运用的结合”。再以分析“缝衣歌”为例，把女工的生活主题和平白如话的诗歌语言结合起来。这些不同体裁的外国译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主题和满足新文化多样表达方式的需求上发挥特有的功能和作用。

对选编外国译作，早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初，夏丏尊先生就很有见地。他对于国文科的学习，有过一个理想的标准：“能从文字上理解他人的思想感情，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能不至于十分理解错，发表错。”他热诚地希望学生应“是一个中国人”，同时“又是一个世界上的人”，这就是说，一个现代的人，他要具备现代的眼光、胸怀、水平和程度，并为以后的学习找到门径。八十多年前，夏丏尊先生对外国译文选编在国文教材中就很重视，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郭睿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就更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

统览全书，郭睿对我国近代国语（文）教科书中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成因的分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徐老关于我国文化教育的基本思想是相符的。新世纪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已经过去十余年了，单就教材编写说，许多问题还亟须解决，如果我们能分门别类认真地研究，对于课程改革的深化是会有所促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郭睿的研究，对语文课程的相关改革，是有启发的。

序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丛立新

这本书是郭睿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完善而成的，得知终于可以出版，非常高兴。

在天翻地覆的近代中国历史上，外国翻译作品进入中小学国语（文）教科书大概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尤其是比起刀光剑影的战争风云、波诡云谲的政治较量、出生入死的革命活动等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来，教科书选些什么样的文章，算得上是可以从容不迫的小事。但在文化教育领域，这却是一个意义丰富的事件，特别是在战争与革命告一段落后，由于教育活动自身的性质，越发韵味悠长，日益显示出其深远影响。可以说，准确解读这一事件，对于深刻理解昨天及今天我国语文课程及学校教育，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语言文字与文化难解难分，中国语言文字的源远流长更是每个中国人为之骄傲的。甲骨金文、正草隶篆、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诗词歌赋……祖祖辈辈留下的文化宝典一直塑造着炎黄子孙的精神气质。先人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吧，在 20 世纪之初，继承着这份丰厚遗产的文化精英们，殚精竭虑要做的一件事，竟然是如何将各路“蛮夷”的文学作品纳入培养“龙的传人”的内容体系之中，而且还是国语（文）这样最基本的科目。

人们常说，文化往往是在不同力量的冲突碰撞中实现交流并获得新生的，具体到语言文字领域更是不乏其例。“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英语从意大利语中借用的那些词汇，尤其是艺术的用语，如咏叹调、明暗对照法、壁画和广场等，就向我们表明了这两种文化

的一些情况：在艺术上，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而英国正在有意地追赶着它。同样，法语在 18 世纪也向英语借用了一些词汇，特别是政治用语，如预算、俱乐部、陪审团、传单和投票等，因而说明了这两种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差异，同时也表明在法国有过一场以英语为榜样的运动。”当然，这种情况属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影响，不能与本书所做的研究进行简单类比。本书所论述的“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要复杂得多，其中交叉涉及的至少有文言与白话、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诸多关系。不过其中所谈到的借用情境的确有相通之处。

本书的前身——郭睿的博士论文，最初选题时并不顺利，在接二连三的题目被我们师生二人先后否定之后，最终提出的这个题目，一下子勾起诸如上述的浮想联翩：应该是值得做的吧，应该是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吧。

本书对“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探讨，沿着三条线索展开。首先从宏观历史背景着眼，为深入具体地分析问题建立了基本框架。诚如郭睿在书中所说，外国翻译作品入选国语（文）教科书这一事件，“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坐标系中，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话语方式的演变，才能看清楚它们的内在原因和发展轨迹。”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这一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既不会早 200 年也不会迟 200 年，离开大的社会变革背景，离开现代教育在中国的艰难起步，是一定不可能发生的。这一小小事件，只能也必须在宏大的近代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其次追溯了教科书编辑群体的形成，探讨精英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强烈使命感推动下，围绕教科书这种特殊读物的种种尝试，以及由此实现的身份认同。说来有趣，对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文化巨匠，许多人熟知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却未必了解他们在教科书编辑领域也曾经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

全书研究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我个人以为最值得称道的，基本

观点即“翻译作品在思想主题和语言形式上的典范性能够承载时代对于教育的要求”。说起来，如果这个部分没有足够的分量，研究不仅是有缺憾的，甚至是难以立足的。毕竟宏观的社会历史和教育变革背景对于学校系统建立和课程门类设置的影响是共同的，精英知识分子救亡图存也还有诸多途径。将大量外国翻译作品纳入国语（文）教科书需要更为充分、更为具体的理由，而“典范性”恰恰是最合理的解释。大胆假设是需要小心求证的，郭睿在此所作的研究可以说是扎实厚重的。从白话文运动，翻译作品与白话文关系，到对白话翻译小说、戏剧、诗歌的详细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翻译作品在思想主题和语言形式上的典范性及其所承载的时代对于教育的要求。应该说，这是对这一事件深达本质的洞见。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郭睿是个喜欢耍耍小聪明的家伙。直到亲眼看到他在论文写作时的状态，特别是一头扎进图书馆且乐在其中的劲头，我这个导师才又重新认识了这个学生。这个论文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对我这个做导师的来说有点“越界”了，除了教育史、课程论外，毕竟有许多问题都需要深入到语文教学领域深处，那时心里不免惴惴，是学生的勤奋给了我底气。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拿到书稿后发现，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有了相当的充实和完善。我知道像郭睿这样的“青椒”们在单位里面是承担着各种各样繁重任务的，这些后续工作只能凭借着一份执着才能够完成。

毕竟该书只是初步的研究和尝试，其中幼稚之处、单薄之处是免不了的。但我希望、也相信郭睿会将研究继续下去，也相信，目前的成果在学术研究领域和改革实践领域都是有价值的。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3
一、问题的提出	3
二、研究的意义	5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7
一、近代国语（文）课程标准对外国翻译作品的规定	8
二、1949 年以前期刊文章对外国翻译作品的研究	9
三、1979 年以后期刊文章对外国翻译作品的研究	14
四、关于国语（文）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博硕士 论文评述	16
第三节 概念界定及说明	19
一、概念界定	19
二、两点说明	22
第二章 教育话语的变迁	25
第一节 中体西用：清末教育话语	27

一、“中体西用”成为主流教育话语·····	28
二、“中体西用”教育话语的实践·····	33
第二节 启蒙：“五四”前后的教育话语·····	47
一、“启蒙”话语成为主流教育话语·····	49
二、“启蒙”话语成为官方教育话语·····	55
三、“启蒙”教育话语的实践·····	61
第三章 教科书编辑者的身份认同 ·····	85
第一节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87
一、认同危机的产生·····	88
二、认同危机的解决·····	92
第二节 近代知识分子与国语(文)教科书的 相互选择·····	95
一、近代知识分子对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择·····	95
二、国语(文)教科书对近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102
第三节 国语(文)教科书编辑者“精英”身份的形成·····	114
一、编辑者个体“精英”身份的形成·····	115
二、编辑者“精英”身份的群体认同·····	125
第四章 外国翻译作品的典范性 ·····	135
第一节 外国翻译作品在语言(白话)上的典范性·····	138
一、白话合法地位的确立·····	139
二、知识分子对白话的建设·····	143
三、外国翻译作品在白话上的典范性·····	148
四、语言变革对外国翻译作品入选国语(文)教科书的 促进·····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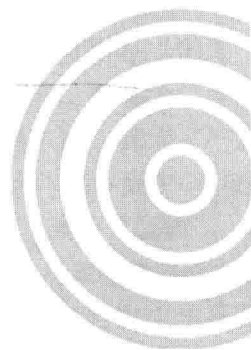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外国翻译作品在思想主题和体裁格式上的 典范性	188
一、翻译小说作品的典范性	189
二、翻译戏剧作品的典范性	206
三、翻译诗歌作品的典范性	218
结 语	232
参考文献	244
附录 1: 1900—1937 年间国语 (文) 教科书主要编辑者事略 ...	262
附录 2: 我国近代国语 (文) 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表	277
附录 3: 《最后一课》《卖火柴的女儿》《春天与其力量》文本 ...	330
附录 4: 《月起》(<i>The Rising of the Moon</i>) 文本	339
附录 5: <i>Song of the Shirt</i> 及其翻译版本	350
后 记	363

第

一

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清朝末年，以外国传教士为媒介，‘教科书’‘课本’等名称开始在中国出现，后来，随着西方课程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国内有人尝试编写蒙学语文教材。”^①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国语（文）学科正式从我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中分离出来。

国语（文）学科在独立之初名为“词章”或“中国文字”（中学则称为“中国文学”）^②，在教科书名称中一般简称为“国文”。翻阅这个时期的教科书及相关研究资料，笔者发现，被称为“早期语文教科书雏形”的《蒙学课本》和《蒙学读本》^③，选录了一些由西方的人物传记或科技作品改编的通俗白话作品。到1920年，教育部下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国语”，小学国语（文）教科书中由西方人物传记或科技作品改编的白话文数量大幅上升。其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的中学国语（文）教科书——《白话文范》。这部由洪北平和何仲英编辑的教科书，第一次选录了四篇外国翻译作品：《最后一课》（法国都德著，胡适译）、《缝衣曲》（英国虎特著，刘半农译）、《航海》（俄国屠格涅夫著，耿济之译）和《三问题》（俄国托尔斯泰著，张三

① 洪宗礼. 汉语文教材评价 [C].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5.

② 设科之初，并没有“语文”这一名称，当时的教科书中多使用“国文”或“国语”这一名称。依据叶圣陶对于“语文”定名的解释：“‘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

③ 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中体西用”教育话语的实践部分。

眼译)。^① 1922年实行新学制以后,选录外国翻译作品更是成为当时中小学国语(文)教科书的普遍现象。据笔者查阅北师大库本阅览室和人教社阅览室所收藏的解放前中小学国语(文)教科书情况来看,除了傅东华主编的《复兴教科书国文》外^②,其余的国语(文)教科书都或多或少地选择了一些外国翻译作品。有的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比例甚至达到了四分之一还多,如孙良工和沈仲九编辑、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

近代国语(文)教科书中存在的这一普遍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作为母语教学的主要凭借,国语(文)教科书中为什么会选录外国翻译作品呢?顾名思义,“国语(文)”本来就是学习本民族语言的,而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事实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母语教学资源,但教科书编辑者为什么还要选择外国翻译作品?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着怎样的关系?编辑们选录外国翻译作品又是基于怎样的认识和考虑?与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精品佳作和当时新创作的本民族作品相比,外国翻译作品究竟又是凭借什么特点被选进国语(文)教科书的?

基于上述这些问题,笔者围绕“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外国翻译作品”这个主题进行了文献检索,试图找到相关线索和可能的答案。在初步阅读文献后,笔者发现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

① 查阅“人民教育出版社民国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图像库”,《最后一课》曾入选各种国语(文)教科书50次,《缝衣曲》入选3次,《航海》入选4次,《三问题》入选6次。

② 从北京师范大学库本阅览室所藏新中国成立前国语(文)教科书情况来看,在初中国语教科书中,只有傅东华主编的初级中学《复兴教科书国文》没有选录外国翻译作品(在“编辑大意”中明确表示“译品一概不收”),其余的初中国语(文)教科书都选录了为数不少的外国翻译作品。让人颇觉意外的是,虽然在自己主编的《复兴教科书国文》中拒绝选录外国翻译作品,但傅东华却是一个在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翻译家,翻译了很多作品。虽然是翻译家,傅东华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欧化”语言。他认为“文艺”贵创新,即“模仿的”文艺和“因袭的”文艺不能算创新。在傅看来,“欧化”的“化”字,已经包含模仿的意味在内。既然反对“欧化”语言,却又在他担任第二编辑的《基本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国文》选录了很多的外国翻译作品(本套教科书陈望道任第一编辑)。

包括对其演变的研究、对其教授内容的研究、对其教学方法的研究、对其作用的研究、对其性质及其在国语（文）教科书中地位的研究、对其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内容的研究等。毋庸置疑，已有的这些研究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针对“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原因”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却不够多，其中针对“近代外国翻译作品最初入选国语（文）教科书的原因”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更少。为此，笔者进一步查阅了清末民初的国语（文）教科书、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课程史以及近代出版发行的教育杂志等相关资料，把上述问题聚焦，形成了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我国近代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拟展开深入地探讨和分析。

二、研究的意义

本书拟从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教育话语、国语（文）教科书编辑者的身份认同以及外国翻译作品在某些方面的典范性三个角度展开，力求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近代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原因”进行探讨。对该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国语（文）独立设科时的历史语境，而且对当前的国语（文）教科书编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一，本研究对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增进人们对国语（文）学科历史的了解，尤其是对从19世纪末国语（文）独立设科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段历史的了解。以前大家习惯于将近代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的原因归为当时本民族创作的白话文作品比较短缺。^①但事实上，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是一个复杂

^① 龙军：《建国后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外国作品编选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论文，2004：12。